

# 徐敏： 印尼归侨身份 “边界” 流变初探（中）

关系的影响。作为个体，不可避免在国家的框架下活动。国家的权力指向和相关政策一定程度上造就或强化了个体对于群体意识的认知与选择。由于印尼政府曾长期排斥华人参政、参军，并在这些领域给华人划下了有形或无形的苛刻边界，印尼华侨华人大多数从事商业。即便如此，他们在印尼的经商环境也并不总是稳定的，经常会遭遇歧视与排斥，有时会遇到烧抢等暴力事件。

另外，殖民历史对印尼华侨华人身份“边界”的强化作用不可忽视。20世纪初到50年代，印尼经历了荷兰殖民统治、日本占领、独立战争、苏加诺执政等几个重要阶段。华侨华人的生活也动荡不安，异常艰难。尤其在日本对印尼的轰炸中，不少人不幸遇难。有一位访谈对象的父亲就在一次轰炸中离去。“我关于印尼最早的记忆是5岁那年。1943年前后，我家和大伯等亲戚一起生活在万鸦老下面的一个乡村。当时日本人的轰炸不断，我们经常躲在防空洞。有一天我看见妈妈穿着白色的麻布衣服，出去才知道我父亲被炸死了。”

1946年印尼独立

后，前期对华侨的入籍政策相对宽松。但要出籍则相对困难，必须“具备足够的证件”。华侨在印尼各地辗转谋生，很多人的证件早已不见踪影。即便这样，“到1954年被动入籍者只占30%，主动脱籍者占70%”。而到后期印尼的政策则刚好相反。对华侨而言，下南洋之初仅为了“讨生活”，并没有移民的概念。在当时的情境（1946—1954年）下，华侨入籍表面上能省去不少麻烦，但纯属被动选择，其中蕴含着强制与排斥的意味。1954年是印尼国籍政策变化的分水岭，政策的调整加剧了华侨华人不稳定的生存状态，一批华侨华人离开印尼回国或辗转到其他国家和地区。至1962年，印尼华侨华人总数中（包括印尼出生者与中国出生者）有三分之二仍为中国籍，只有三分之一为印尼籍。事实上，即使华侨加入了印尼国籍，也很难取得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帕特认为，绝对的族群区分并不是依赖于流动性、接触和信息的缺失，而是必须包括排斥与包含的社会化过程。华侨华人正是在本地人的排斥与包含中形成了明



晰的群体边界，产生了对祖籍国的强烈认同。换言之，群体的边界是在社会互动中形成的。

## 二、改革开放后印尼归侨身份“边界”的重构

在印尼，特定时空下华侨华人与当地人互动所生成的“边界”更多是建立在中国人身份及对祖籍国想象的基础上。回国后，由于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国内侨务政策的调整，归侨与海外的联系经历了很多曲折。改革开放后，随着侨务政策的开放和落实，华侨、归侨、侨眷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护，中国公民出国渠道拓宽、手续简便、制度完善。不少归侨重返印尼探亲访友，他们与不同群体的互动更为频繁。在不断遭遇他者的过程中，印尼归侨在自我和他者的“

意会”中给自己贴上了“印尼”标签。

标签背后是对过去生活的记忆与怀想。一方面，通过公共空间和私人领域的表达，生于不同年代的印尼归侨和华人形成了关于印尼的共同情感，产生了特定的身份“边界”；另一方面，归侨对于印尼的情感更多在于对曾经“家”的想象，代表着过去的生命历程和跨国体验，即使大部分人仍不认同印尼本土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

### （一）语言、饮食和舞蹈：公共空间“边界”的重构

所谓边界不一定是物理性，它可以是他我遭遇之际有意或者无意间表现出来的用以体现彼此有别的方式和语言。在印尼归侨侨眷联谊会活动日上，会员们相互打招呼会说印尼语，然后用带有印尼语音、

语调的普通话、客家话、闽南语或是当地方言交流。此时，语言使得“归侨”这一身份在特定时空得以彰显，拉近了彼此的关系。虽然印尼归侨很热情，但第一次见到笔者这个“外人”，他们基本都会用印尼语互相询问笔者的身份。这时，语言又作为分类实践的一种形式，在笔者与印尼归侨之间划上了一条无形的“边界”。

如果说语言拉近了“我群”距离，区别了他我，那么公共空间中，饮食和舞蹈则是“边界”重构的重要途径。虽然印尼归侨侨眷联谊会每年只在春节、中秋有两次相对固定的活动，但在笔者六个月的调研中，联谊会的文艺组被邀请表演的次数已远超两次。省、市、区侨联甚至有些社区都会邀请他们表演，同一个节目也常在不同的舞台上演出。以下是2017年9月27日上午举行的一次小型国庆、中秋座谈会的情形。

联谊会文艺组借用了FZ社区的活动室排练节目，该社区领导将要来看望他们。归侨们在前一天做好了分工，几位女性归侨准备了九层糕、印尼虾片、糯米鸡丝卷等具有印尼特色的食